

漢唐
陽定

【重建中国价值】系列

刘刚
李冬君 著

文化的江山

【上册】

重读中国史

两千多年来，历史已习惯于用王朝为中国命名，久而久之，忘了中国本身，以为王朝就是中国，唯有在王朝崩溃时，才发现它只是过客。

王朝中国已破落，不过，还有文化中国可坚持。

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刘刚
李冬君

文化的征物

【上册】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发现文化的江山

你知道吗？中国历史上，其实有两个中国。

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，叫做王朝中国。

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，叫做文化中国。

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，短则数十年，长则数百年，难逃一亡，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，历百世，还在发展，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。

江山自然生成，人居其中，文而化之，渐成国土。

英雄行走大地，于江山之中，规划国土，以河图洛书，为天地象数，立宇宙原型，而开辟家国，使文明初曙，而有《山海经》世界。

《山海经》是一部传说时代的文化中国图志，无论它成书于何时，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，光怪陆离，无比精彩！

《山海经》是自由的世界，而非大一统世界，是英雄世界，而非神的世界，其主体为人，是用形形色色之文明包装了的万物之灵，而非神。

《山海经》世界，不仅在传说中存在，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，江南良渚文化和吴城文化，还有古蜀三星堆文化，也许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。

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，《山海经》无非“怪力乱神”，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，《山海经》是一座文化的江山，是文化中国的摇篮。重读中国历史，要从《山海经》开始，这是我们写完本书以后的一点新觉悟。

由此可见，我们后知后觉，留了遗憾。然而，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，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作《文化中国图志》，将从《山海经》开始。

王朝赫赫，为历史表象，江山默默，乃历史本体。

表象易逝，王朝只是命运的一出戏，帝王将相跑龙套，跑完了就要下台去，天命如此，他们不过刍狗而已。改朝换代，但江山不改。

文化的江山，承载着历史，承担了未来，向命运敞开了它的怀，命运投入江山的怀抱，在它的怀里起舞，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王朝演出。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秦汉两朝已去，可关山依旧，明月依然，这关山啊，就是文化的江山！命运诗意的栖居于江山，我们知天命以诗。

重读中国历史，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，不要放在王朝里读，要用诗性的眼光读，不要用“资治”的眼光读，以诗性之眼，能读取文化的江山，用“资治”的眼光，只能围绕王朝打转，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。

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王安石用了诗性的眼读取江南，诗中有“我”，“我”在选择，放下王朝，他抱住江南——诗的江山。陈寅恪“以诗证史”，亦是诗性的，一部《柳如是别传》，以其文化个体性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座文化的江山，还是江南——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江南。

诗性的眼光，本身就含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以之观史，使王朝中国黯然无光，而文化中国则大放光芒。我们来看盛唐，盛唐气象并非那些帝王将相，而是唐诗的江山。试问有唐一代，有多少帝王？翻一下二十五史里的《唐书》就知道了。他们从字里行间，列队而出，向我们走来，除了李世民、武则天，我们还认识谁？还有一位李隆基；对不起，我们知道他，是因为杨贵妃，一首《长恨歌》便盖过了他的本纪。他是王朝的太阳，光芒万丈，可在《长恨歌》里，美是太阳，集中在杨贵妃身上，留一点落日余晖，让他来分享。

文化的江山里，没有统治者的位置，要坐文化的江山，帝王也要写诗。然而，诗性是天命和天道的吟唱，它并不特别钟情于帝王。据说，乾隆皇帝爱写诗，一生写了四万多首，他一个人就赶上了《全唐诗》，可有哪一首诗能流传至今？大鱼大肉的四万首诗，还抵不过李白清清淡淡的一篇。月光下，摇篮旁，母亲在吟唱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

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就这样，唱了一千多年，至今还在唱，那一缕缕诗性的光芒，照亮了婴儿的脸庞，温暖了孩子们的心房，文化中国的公民们就这样成长，我们看到了希望。

中国是诗性的国度，唐诗的江山虽然灿烂，但还是不及先秦时代诗性在天。当诗性以天命和天道呈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怎么还敢说中国不曾有过哲学的诗篇？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难道不是一首最好的形而上学之诗？还有《孙子兵法》，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兵法？天地人总体战，唯有诗才能表达。

有见于此，本书亦以近于诗的形式，用诗话体来写史了。王国维那篇《人间词话》作了我们的榜样，他以诗话体行文，却写了一篇关于唐宋词的论文，我们自问，能不能也以诗话体行文，去写一部诗性的中国通史呢？

我们这样想了，也这样做了，做的成果，就在这本书里。

书的内在精神，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；书的美学形式，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。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，形成本书，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。

从文化个体性出发，我们走向文化的江山，重读中国历史，就是以自我对历史进行选择，以文化个体性，对历史进行价值重估和本体重建。

历来写史，都以王朝为本，以帝王为中心，写的都是王朝史，即使以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主线，写来写去，也都是些改朝换代和开国皇帝的故事，那根线，还捏在王权的手心里，被王朝史观牵引着，进入中国历史。

然而，还在20世纪初期，不就有新文化运动，开始“反封建”了吗？反了近一个世纪，为什么还反不出王朝中国？反不出王朝史观呢？

如今我们来反思，这才发现，“反封建”在反到“人民”与“革命”这两个最为神圣的观念时，就不前了，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没有越过这一步。鲁迅面对黄包车夫尚且要“榨出皮袍下的我的小来”，他对“国民性”的批判，也就停留在“文化人民性”的重建上，而少了一点“文化个体性”的自觉。

中国历史上，以人民与革命来“反封建”，反了千年，反掉了多少

个王朝，也反不掉王权，反不出王朝中国和王朝史观，反来的只是王朝重建。有人说，“反封建”反过了头，要向后转，往回走，而我们认为，还没有反够，还要把当年用来反的东西，民本主义里的人民，圣人革命中的革命，统统都反掉。

马克思说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。他在批判中，发现了什么呢？他发现了“人”，发现了近代意义的自由平等的“社会性的人”。这还不够，还要发现“我”，去发现现代意义的独立自主的“文化个体性”的“我”。

“反封建”，还要反王权。要对封建主义作社会形态的批判，以确立人的社会性；还要对王权主义作文化质的批判，以确立人的文化个体性。

确立文化个体性，要自觉而非启蒙，要自律而非规定，要自由而非强制。要以自觉认识自我，以自律规定自我，以自由确立自我，自由个体的法权形式是公民。以此，我们就有了文化个体性的原则：自觉、自律、自由。

自觉是自我意识觉醒，自律是自我本质确定，自由是自我价值实现。自我以法权形式转化为公民，自我意识、自我本质、自我价值，也以法权形式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，使自我意识转化为公民意识，自我本质转化为社会本质，自我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。而我们，就在转化中。通过对王权主义的批判，我们转向文化个体性；以文化个体性重读中国历史，我们转向历史是自我的一种选择。

历史上有两个中国，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，我们选择了文化中国。这样，我们就从文化个体走向文化中国，在通往自我之路上，一步步发现文化的江山。

目录

壹|“中国”史与思

1. “中国”的来历——古史探源 /2
2. “中国”的来历——国号反思 /15
3. 文化的边疆——孔子视野 /28
4. 文化的边疆——太史公方輿 /41

贰|天命与革命

1. 天命在哪里——殷周往事 /57
2. 革命：从理想国到家天下 /69

叁|春秋之美与思

1. 春秋故事从美开始 /79
2. 天命无常之礼与诗 /89
3. 诗的中国及其风雅——“南化” /96
4. 诗的中国及其风雅——“忧雅” /105
5. 《诗经》时代的民主政治尝试 /112
6. 锦绣江山与美的儿女 /119

目录

肆|春秋之王与圣

1. 历史之王——桀王 /132
2. 春秋圣化大趋势 /139
3. 孔子之道与孔门弟子 /143

伍|战国之力与思

1. 战士与策士 /150
2. 诸侯与诸子：西河之学 /160
3. 诸侯与诸子：稷下先生 /170
4. 孟子“行仁政”记 /183

陆|战国之侠与思

1. 孟子“辟杨墨”与墨子非儒 /197
2. 墨子“知”之花：墨辩与墨侠 /203
3. 惠施将杨墨“合同异”了 /216
4. 纵横家与思想者的故事 /224

目录

柒|战国之乐与悲

1. 庄子是一条想飞的至乐之鱼 /234
2. 大匠庄子及其两位质人 /241
3. 谁是郭店竹简书的主人 /248
4. 由“大一生水”猜想屈原之死 /256
5. “为我”之诗及其魂兮 /2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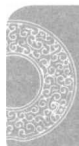
捌|先秦诸子大结局

1. 天地一指——老子与孔子 /274
2. 帝王学在秦岭—淮河那一线 /283



『中国』史与思

周公的封建制中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，以中国为中心，经营天下，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——周礼，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。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——周礼中，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——中道思想，一种新的精神——仁爱精神。以中道立国，是为中国，仁者爱人，使中国超越王朝，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——使天下为一家，中国为一人。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，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。



1

“中国”的来历 ——古史探源

寻常称谓，往往有深意，我们太熟悉了，反而忽视。

例如“中国”，谁人不知？可猛然一问，就发现自己无知。

还是请教专家吧。于省吾老先生，早就写了《释中国》一文，他告诉我们，“中国”一词，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，他提到了一件物证。

1963年，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“何尊”，“尊”为酒器，用青铜制成，铸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，有三字残毁。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（今河南洛阳）建都一事，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。其中提到，武王克商以后，曾告于上天：“余其宅兹中或，自之乂民。”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我已经据有中国，统治这些百姓了。”“或”是地域，用城墙围起来——“口”，就成为“國”了。

所以，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，汉代的《说文解字》就说，“國”字，“从口，从或”，意思和“邦”字一样。后来南唐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也说，“口”是指疆界，“或”就是域字。清人段玉裁作注说，“古或、国同用。”

这样，他就从金文中找到“中国”的来历了。同时，他还指出，在《尚书》里面，有“梓材”一篇，也提到了先王和“中国民”，说皇天已将“中国民”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——武王了。按照王国维的“两重证法”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，“何尊”和《尚书》都提到的周武王时，已经有了“中国”名称。

胡厚宣先生《论五方观念及“中国”称谓之起源》一文，则以甲骨文为据，考释出商自称“中商国”，因而断言，此为“中国称谓的起源”。

然而，商虽有中心意识，但其“中国”观念尚未形成。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，而商朝老是迁都，所以，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。

中国观念的形成，与封建制并行。西周初年，行分封，授民授疆土，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，而王权所在地，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——中国。《诗》云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《春秋·毛传》曰：“中国，京师也。”

中国绥服四方，靠什么呢？靠封建制。周以封建制，使天下中国化，将中国逐步做大。成周之世，中国之地最狭，被蛮戎夷狄包围。那时，吴、越、闽、楚为蛮，秦为戎，齐、鲁虽为封建之地，但周边都是夷，用夷礼。到了东周时期，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，加上西周封建的鲁、齐、晋、宋、蔡、陈、卫诸国，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粗具规模了。

近人柳诒徵指出，中国之名始见于《禹贡》，为后世沿用。《禹贡》也是《尚书》里的一篇，成于何时，则言者纷纷，而他确信，《禹贡》篇成于“茫茫禹迹，画为九州”之时，他说《禹贡》地理观，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。

此说甚宏，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。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。因此，当青铜器“何尊”出土时，中国之名就从“茫茫禹迹”后退到了周武王时，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。而《禹贡》里的“九州”、“五服”天下观，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。

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《禹贡》，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，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。以流域规划疆域，将国土分为“九州”：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以封建确立“五服”：甸服、侯服、绥服、要服、荒服，以文化想象力设

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。

《禹贡》以“九州”划定华夏地域，而以“五服”经营之。“五服”，以京师为中国（东汉刘熙曰：“帝王所都为中，故曰中国”），向四方发展，每五百里为一“服”，这样一看，《禹贡》的地盘有多大呢？向东到了海边，往西靠近沙漠，从南到北都贯通了，这样一个规模，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。

这篇文献，虽然不到一千二百字，但很重要。文明初期，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，实在令人惊叹。《周礼》将“五服”发展

“中国”初现“何尊”

何尊，是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，不算大。但它对于当时人来说，为器虽小，为礼实大。器形为“尊”，装饰繁复，蕉叶纹、蛇纹、雷纹、饕餮纹等，布于器之通体，层累叠加，反复强调其高贵和权威的气质，宣示王命。不难看出器主的神圣用意和艺匠的心领神会，庄严、神秘、训诫、威仪天下的诸多内涵与火热的青铜液体，于注入母范之瞬间，浇铸了历史。

器内底有铭文12行122字，残毁三字，却依旧令人惊喜。

成王五年四月，他在一次祭典上，对宗族小子“何”训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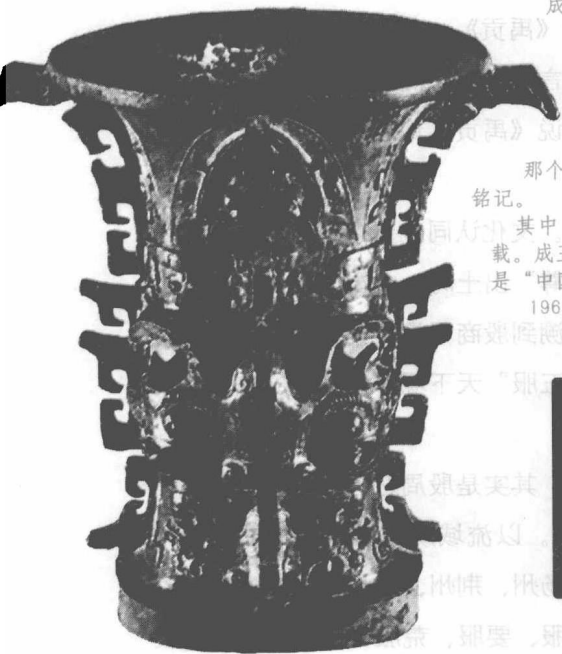
尔父曾追随文王，文王受命伐商，武王灭商，皆祭于天。

作为武王之子，我决定在洛阳营建东都，以此作为中国。

那个名叫“何”的宗族小子，为纪念成王训话，铸尊铭记。

其中“宅兹中国”之铭文，是“中国”二字最早的记载。成王以为他已经住在天下的中央了，天下之中央，就是“中国”一词最早的意义。

1963年，何尊在陕西省宝鸡市东北郊的贾村现身。



何尊铭文

为“九服”，但大的格局未变，后来，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。

周礼，是一种制度性文化，是以宗法为内核、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，而《禹贡》里的天下，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。

当封建制用“五服”来表达时，“绥服”是关键。甸服、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，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，所以说，绥者，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。绥服五百里，分为两部分，其内三百里，因为接近侯服，而行文教，使之中国化；其外二百里，则近于要服、荒服，故行武卫，奋武以卫天子也。

周初分封，要求鲁、卫两国，用周法而行文教，而齐、晋两国，因为迫近夷狄，所以要用戎法，奋武卫以攘夷。“五服”之中，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，文教不及，就以武力。绥服以外尚有要服、荒服，则羁縻而已。

孔子说“吾从周”，他周游列国，就走了一条“吾从周”的路线。首先，他去投奔的国家，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，如鲁、卫、齐、宋、蔡诸国，而非秦、楚、吴、越等蛮戎之邦；其次，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，他待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、卫两国，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。

不过，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，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，他曾说过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”。管仲是他的前辈，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，成就霸业，一度成为他的榜样。所以，他说，如果没有管仲，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，披头散发做人了。这样做人，当然不是做中国人，而是做夷狄之人了。

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。在孔子看来，当时最大的问题，是做什么人。为此，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，其中有等级和名分，有仁义和亲情，但不管有什么，先要解决的问题，是做什么人，是做中国人，还是做夷狄之人？这就是华夷之辨，是根本，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，还谈什么礼啊仁！

因此，齐国很重要，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。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，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。当时，齐、鲁两国毗邻，如果按照“五服”来分属于绥服，鲁行周法揆文教，齐行戎法奋武卫，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，结果，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，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，而拒绝了。

后来，孔子周游列国时，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，可他北上，刚到黄河边，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，赵简子在晋国执政，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，所以，他就停下脚步，不想去了。他认为，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，就要乱了。

于是，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，秦虽西戎小国，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，移风易俗，中国化了，而且继齐、晋以后，奋武卫，行霸道，尊王攘夷，也成就了霸业。因此，当齐景公问他，秦国为何能称霸时，他回答说，秦虽小国，可志向远大，秦虽地僻，但立国中正。他这样回答，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。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、越，虽然也关注了，却没有这样来评价。

后来，齐、晋两国果然就乱了，田氏代齐，三家分晋，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，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，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，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，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，原先是蛮、戎的楚、秦两国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全盘中国化了。中国大了，封建制离析了，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。

于此，我们可见孔子的伟大。他建立了一个从尧、舜到周公的道统，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，他自始至终维系着。用周法不行了，可周道还在；王朝中国垮了，可文化中国还在。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，时常梦见周公。

从孔子开始，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，孔子去世以后，留下一部《春秋》，为中国立史。钱穆说，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，有道理。如果修正一下，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，那就更为合适。儒者的思想，经常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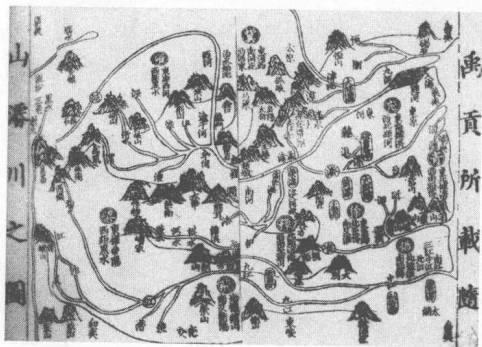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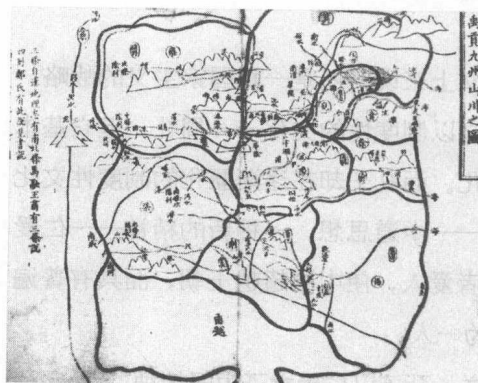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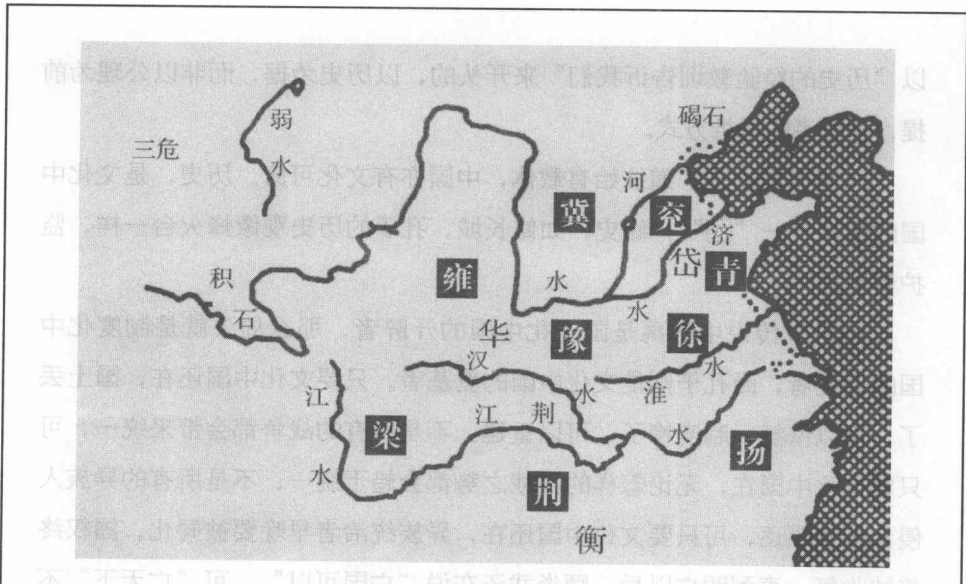
以“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”来开头的，以历史为据，而非以公理为前提，乃儒者的思维方式。

《春秋》立史，道统始有载体，中国亦有文化可倚。历史，是文化中国的围城——“□”，修史，如修长城。孔子的历史观像烽火台一样，监护着历史。

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，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，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。只要文化中国还在，国土丢了，可以恢复，制度垮了，可以重建。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，可只要文化中国在，无论怎样的乱战之势都会趋于统一；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，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，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，国权终将被收复。直到明亡以后，顾炎武还在说“亡国可以”，可“亡天下”不行，天下是什么？就是文化中国。

周公的封建制中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，以中国为中心，经营天下，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——周礼，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。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——周礼中，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——中道思想，一种新的精神——仁爱精神。以中道立国，是为中国；仁者爱人，使中国超越王朝，而具有普遍的理想性——使天下为一家、中国为一人。

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，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。●



《禹贡》九州山川图

《禹贡》九州图

《禹贡》是《尚书》里的一篇，如果说《尚书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，那么《禹贡》就是其中最早的地理文献。

《禹贡》1100多字，便将当时山川形势描绘了了然。

从今天来看，九州之分野：冀州为山西省及河北、河南的一部分，兖州在河北和山东，青州位山东省境内，徐州为山东和江苏的一部分，扬州指淮水以南的江苏和安徽，荆州占据湖北境内，豫州占河南省大部，梁州包括四川、西康及陕西省的部分，雍州从陕西省东界绵延至甘肃。

传说大禹治水，将天下划为九州，并依据山川和土壤，制定贡物和赋税标准，故称“禹贡”。以流域规划疆域，乃设想中的九州，大略囊括了两河流域，再配以“五服”之服式，真乃经纬有序，有一种理想化的魅力。

后世皇朝地舆，基本没有脱离《禹贡》天下观的格局。

历代都有人根据文字，想象和描绘《禹贡》中的九州，更有诸多不辞皓首、穷经《禹贡》者，那是对“九州”及其天下观怀有浓浓的乡恋。